

运动员救济性权利研究

陈书睿

摘要:救济性权利为原权利的保障,是为一项基本人权。在运动员原权利遭受侵犯时,应有权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运动员救济性权利的类型主要有申请调解、仲裁和提起诉讼与申诉的权利等。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运动员欲行使救济性权利时往往陷入投诉无门的困境,故首先需要在救济制度上进行完善,或者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亦可在设立专业的体育法院或在现有法院系统内部设立体育法庭。

关键词: 运动员; 救济性权利; 法律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2)05-0002-04

On the Relief Right of the Athletes

CHEN Shu-rui

(Shanghai Sport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Relief right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 original rights and is a basic human right. If an athlete's original rights are violated, h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protect his legal interests. Athlete's relief right includes applying for mediation or arbitration, filing a lawsuit or appeal, etc. But due to various reasons, athletes in China often get into trouble when they want to use their relief right, for they do not know to which department they should lodge the complaint. So what we should do first is to perfect the relief system or establish a special arbitration institute for sport. It is also acceptable to establish a specialized sport court or to establish a sport court within the existing court system.

Key words: athlete; relief right; law

运动员作为我国体育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竞技体育运动的主体,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如何保护运动员权益,是否可以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护,即在体育领域,法律是否可以介入,是否应当介入,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些人以种种理由强调法律不应当介入,主张体育纠纷应当由体育内部的机构解决。运动员作为一个社会主体,在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应当受我国法律的保护,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力剥夺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因此,在运动员利益遭受侵害时,司法完全应当、可以介入,运动员可以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有权利用各种合法途径实现自己的利益。

1 运动员救济性权利的性质和功能

根据权利之间是否具有派生关系可以将权利分为原生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或者原权利和救济权。救济性权利,是指社会主体在其原权利受到侵犯,穷尽个体能力无法保护或实现其权利时,请求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帮助以弥补损害、实现权利的权利^[1]。运动员的救济性权利是在运动员的原权利被侵害时对其被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的权利,如运动员的肖像权被免费使用,运动员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并进行赔偿的权利属于救济权,运动员对其肖像所享有的权利属于原权利。

1.1 救济性权利为运动员基本人权

救济性权利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际人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为人人所得享之,包括运动员。故这项权利不允许任何人和任何机关以任何理由加以侵害,尤其要预防公权力对运动员救济权的侵害。当运动员权利遭受到侵害时,只有通过合法途径对法定权利进行救济,才能有助于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否则,即使法律赋予运动员再多的权利,也都会成为空中楼阁。救济性权利作为一项国际人权和基本权利,反映在一些国际性文件中。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所有人都享有救济权:“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为有效的补救^[2]。”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3]。”

1.2 救济性权利为运动员权利的最后屏障

“有救济才有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这是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运动员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如身份权、公平竞争权、社会保障权、商品化人格权等,这些权利即

收稿日期: 2012-08-27

基金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681SS11089)

作者简介: 陈书睿,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法学。

作者单位: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赛事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8



为运动员的原权利,当这些原权利遭受侵犯致使原权利受损后,原权利即转化为救济性权利,故救济性权利是与原权利相对应的权利,救济权是运动员权利的应有之义。运动员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以自己的力量,或者请求国家强制力,实现对损害权利的补偿,因此,救济性权利是保障权利的权利,是运动员原权利能否实现的有效保证和最后屏障。运动员行使救济权的前提是,原权利被其他社会主体侵害或者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发生了冲突,行使的目的是让权利冲突或权利纠纷得以解决,使其被侵权权利得到恢复和补救,让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弥补原权利所遭受的侵害。故相对于原权利来说,运动员的救济性权利是一种动态性权利,但权利冲突发生时,运动员所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状态被打破,原权利由静态被转化为动态。故其主要来源于规定保证权利得以实现或行使的有关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如仲裁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其主要权利类型包括申请调解的权利、申请仲裁权、诉讼权、申诉权等。

2 运动员救济权实现的重要途径

在权利保障的救济体系方面,救济的途径主要包括: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3],具体的方式包括调解、仲裁、诉讼、行政复议和申诉等。

2.1 申请调解的权利

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或多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有关组织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自愿进行协商,通过教育疏导,促成各方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办法。当运动员因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的机关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法院、行政机关、仲裁机关、律师及体育协会等。在这些调解中,体育行政机关调解和体育协会调解属于体育行业内部的调解,其他都属于体育行业外调解;法院调解属于诉内调解,其他都属于诉外调解。但有时一桩利益纠纷的解决,也许是多种调解共同促进的结果,如姚明的“一元钱”官司。在姚明与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肖像权、姓名权一案中,首先是法院调解,在“双方第一次进行庭外交换证据时,法院就进行了首次调解”,后来“中国篮协也做了大量工作,还派人来上海做调解”,最终“双方最终签署了解协议”,使“本人的权益也得到了保证”。^[4]该案虽然最终以和解的形式解决,但其中也运用了法院调解、体育单项协会的调解。对于由体育协会主持下所达成的调解方案一旦生效,对当事人就具有法律效力,但这不影响一方返悔而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国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授予我国单项协会拥有司法权,因此单项协会做出的裁断不是最终的决定。

2.2 申请仲裁的权利

2.2.1 国内仲裁

仲裁一般是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仲裁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由非官方身份的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进行裁判,并受该裁判约束的一种制度。仲裁活动关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之一。我国的仲裁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仲裁作为一种快捷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也日益

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国目前没有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制度。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双方必须执行。适用仲裁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之间要有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发生争议之前订立的,它通常作为合同中的一项仲裁条款出现;另一种是在争议之后订立的,当事人同意把已经发生的争议提交给仲裁的协议。这两种形式的仲裁协议,其法律效力是相同的。一旦双方当事人同意采用仲裁,一方到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在仲裁裁决后,如果当事人认为仲裁裁决确有错误,也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但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体育仲裁制度。没有建立专门体育仲裁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法律的冲突是重要原因之一。1995年我国《体育法》第33条^[5]规定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并规定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在国务院尚未规定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时,2000年7月1日我国实行的《立法法》在立法权限一章中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制定,而国家法律的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基于此,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确立权力归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体育法》规定的条款则因与《立法法》相抵触而无效,即国务院无权规定我国体育仲裁制度。

2.2.2 国际体育仲裁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CAS),为判决设计体育项目争议的一个国际仲裁机构。1984年6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正式成立。但由于当时《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条例》规定其主席要由国际奥委会主席从法庭的组成人员中指定,而且还必须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并且其一切支出由国际奥委会负担,因此,虽然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被确定为一个独立机构,但由于无论从组织上还是经济上都依附于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独立性是缺乏权威性的。其后由于体育纠纷的种类和数量随着体育商业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步增多,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通过采取建立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6]、修改章程、改变人员构成和财政等措施,最终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体育仲裁机构。该法庭在亚特兰大奥运会(1996年)和长野冬奥会(1998年)上,成功处理了布罗曼坦案和罗斯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这两个案件中推翻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对运动员的处罚决定,成功维护了运动员的权益。现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体育界和国际上已经颇有名声,隶属于不同单项联合会的运动员们在因兴奋剂等问题而发生纠纷时已经习惯于上诉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我国柔道冠军佟文2010年的兴奋剂事件也是通过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最终维护了权益。正如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官员评价该案件说:“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推翻了兴奋剂处罚,佟文申诉成功,意义重大。”^[5]

【案例】2010年4月4日,国际柔道联合会以药检结果呈阳性为由,对佟文处以禁赛两年的处罚,并取消了她在2009年世锦赛时获得的金牌。5月7日,国际柔联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处罚决定。事情缘起于2009年,8月30日的在荷兰进行的柔道世锦赛上,佟文摘得女子78 kg以上级冠军。9月份揭晓的兴奋剂检测结果显示,佟文的A瓶尿样被查



出含有“克伦特罗”。随后佟文申请对B瓶尿样进行检测。但在听取了国际柔道协会的建议后,她又撤回了申请。而争议就在此刻出现。同年11月25日,国际柔道联合会对其的B瓶尿样进行了检测,结果同样呈阳性。2010年7月6日,佟文上诉。2011年1月24日,该案件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所在地——瑞士洛桑开庭。2011年2月23日,受理此案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裁决,他们最终以“流程不符合规定”为由支持了佟文的上诉,推翻了国际柔道联合会禁赛两年、取消世锦赛金牌的处罚并立即生效^[6]。

2.3.3 奥运会特别仲裁

一般而言,提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奥运会特别仲裁庭处理的案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纠纷事项属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所管辖纠纷范围和种类;其次,所争议事项如不及时予以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奥运会的举办和赛事的进行;实践中处理的案件主要是运动员等对各体育组织的决定不服而提起的上诉,主要涉及兴奋剂处罚、参赛资格、对赛场裁判判罚的异议、参赛名额的分配等问题^[7]。

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根据惯例,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设立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临时仲裁庭。该仲裁庭履行以下3项职能:第一,负责依仲裁协议直接向其提起的因体育合同关系而发生争议的案,如体育赞助合同关系、电视转播权合同、运动员转会合同等;以及涉及民事责任的体育纠纷案件,如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发生的伤害事故。第二,作为一个上诉仲裁机构的职能,受理关于因当事人不服某一体育组织就某一事项的裁决(如对违规的处罚)而向其申请处理的案件。第三,发表咨询意见。根据国际奥委会、国家奥委会或国际体育联合会的请求,还可以就体育以及与体育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根据奥运会临时仲裁规则、国际体育仲裁院规则,奥运会期间临时仲裁庭作出的裁决被视为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洛桑总部作出的裁决,故2008年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临时仲裁庭作出的裁决是瑞士裁决而不是中国裁决。如果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只能依瑞士法向瑞士法院提出请求。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的规定,一项仲裁裁决只有在如下特殊情况下才可以被法院撤销:第一,仲裁庭的组成存在问题;第二,仲裁庭缺乏管辖权;第三,仲裁程序对当事人不公正;第四,仲裁裁决违反公共秩序。

2.3.4 提起诉讼的权利

法律是保护人们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穷尽所有手段都无法维护或者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他(们)或她(们)可以动用司法程序,用法律维权,这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任何机构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运动员在其利益遭受侵害时,同其他公民一样可以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可以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依法维护其权利。例如刘翔就《精品购物指南》侵犯其肖像权的纠纷就是通过诉讼的手段,经历了一审的败诉,二审后最终赢得了官司,保护自己的权益。

【案例】《精品购物指南》报社在2004年11月21日出版的报纸封面刊登了刘翔的大幅图片,并配有中友百货公司的广告。首先是一审:起诉——11月29日刘翔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诉称《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精品卓越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友百货有限公司侵犯其肖像权,要求停止侵

权行为,停止使用肖像等。审理——2005年2月18日,此案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判。一审判决——法院的判决结果认定《精品购物指南》使用刘翔肖像属正常新闻报道行为,不构成肖像侵权,并驳回刘翔各项诉讼请求。接下来是二审:上诉——一审刘翔败诉,刘翔不服,提出上诉,要求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终审判决——12月15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翔诉《精品购物指南》一案做出终审判决,判决《精品购物指南》侵犯刘翔肖像权的侵权行为成立,需于30日内登报道歉,并赔偿刘翔精神损害抚慰金两万元人民币。

运动员在运用诉讼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时也应当根据不同的侵权事由而采用不同的诉讼途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生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途径^{【注3】};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社会主体在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适用行政诉讼途径^{【注4】};根据《刑法》规定,在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遭受侵犯,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适用刑事诉讼途径^{【注5】}。因此,运动员在面临权利被侵犯时,如果侵犯事由是运动员与对方之间是平等关系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造成的,采用民事诉讼手段进行保护;如果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运动员的合法权益的,采用行政诉讼手段保护;如果侵犯运动员的私有财产、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则采用刑事诉讼手段保护。

2.3.5 提起申诉的权利

运动员在体育训练或比赛中的合法权益因体育组织或者比赛组织委员会作出的错误的、违法的决定或裁决而受到侵害时,该运动员有向有关机关申述理由,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8]。根据我国相关规定,运动员在注册和交流过程中发生争议问题或出现违规行为,运动员个人也可以向国家体育总局、全国性单项体育运动协会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提出申诉^{【注6】}。

【案例】在20点25分进行的男子110 m栏决赛中,罗伯斯夺得金牌,刘翔获得铜牌,但因为最后时刻罗伯斯拉扯了刘翔,国际田联在听取了代表团的申诉后,经过研究,决定取消罗伯斯的金牌,由原第二的美国小将理查德森获得金牌,原获得铜牌的刘翔现在获得银牌。但就在国际田联做出这个决定后,古巴方面立刻提出反申诉,要求恢复罗伯斯的金牌。经过慎重讨论,国际田联决定驳回古巴的申请,维持取消罗伯斯金牌的判决^[9]。

按照国际惯例,在比赛当中,当赛场上的运动员受到不公平对待,出现裁判误判,或者运动员受到他人影响而裁判未做出表示时,可以在比赛结束30 min后到达指定地点进行申诉。于是男子110 m栏决赛结束,在仔细观看了大屏幕后,中国代表团决定提出申诉,因为公平,因为权利及职责^[10]。

2.3.6 提请行政复议的权利

运动员在选拔、体育训练或比赛及保障中的合法权益因体育行政机关作出的错误的、违法的决定或裁决,或因体育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受到侵害时,该运动员有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述理由,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我国《行政许可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



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如果运动员对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裁决或处罚有异议,可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复议申请^[注7]。在我国,比较有争议的是单项体育协会能否作为行政复议的处理机构。根据单项体育协会本身的性质,作为一个行业组织,它是一个民事主体,但实际上它往往扮演着行政机构的角色,行使的职权也多是行政职能。故如果运动员与其所属单项协会内部的其他成员发生权利纠纷时,根据成员的请求,可以作为调解人介入到成员之间的纠纷,这是毫无争议的。但能否作为运动员与单项体育协会发生权利纠纷时的行政复议机构,则是有待商榷的。

3 运动员救济权利的主要问题及完善

一般来说,运动员在遭遇体育行业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侵犯其利益的行为时,大多运动员都会依法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在运动员遇到“问题”时,他们往往感觉“投诉无门”:他们想去法院起诉,但法院说他们的事是体育内部的事情,不受理;去体育机关申诉,但想到以后自己还要在体育事业上有发展,担心申诉后自己受排挤,甚至连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没有。其实,中国运动员之所以会在权利保护中遇到这样的困境,其原因在于我国运动员权利保护程序的不健全、不完善。当运动员的权利无法完全通过体育行政程序得到保护时,应当建立或完善多种救济途径,而司法救济应当成为保护运动员权利的最后屏障。

在我国确立什么样的运动员权利救济制度,直接关系到权利保护的效率和公正,关系到能否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与争议,最终实现保护运动员权利的目的。由于运动员职业周期时间短,比赛的时效性强,以及体育的专业性等,建立或完善运动员权利保护的司法程序应当符合便捷、迅速和专业等要求。对于因侵害运动员利益而引起的纠纷,可在我国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制度。体育仲裁的适用可以采用两种模式,一是和普通的仲裁一样,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有仲裁协议;二是凡有关的体育纠纷,都属体育仲裁机构管辖,无论是否有仲裁协议,即由体育仲裁机构专属管辖体育纠纷。但无论采用哪种模式,都不排斥司法介入的问题,当事人任何一方只要认为仲裁裁决确有错误时,还是可以在法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除了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外,还可以建立独立的体育法院或者在现有法院系统内部设立专门的体育法庭。无论是体育法院还是体育法庭,其诉讼程序的适用和裁决纠纷的依据都可以依据体育的特点而建立特殊的法律制度,如缩短诉讼程序中的时间、简化诉讼程序环节,在必要的情况下适用体育道德作为裁决的依据等。

4 小结

运动员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竞技体育运动主体,在其权利遭受侵犯时,都有权依法使用救济手段进行保护,这是基本人权。运动员可以利用的救济性途径主要有调解、仲裁、诉讼和申诉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中运动员往往遇到无法有效行使其救济权的困境,这其中也有制度性因素。因此,为有效保护运动员权利,在我国应当建立起

符合体育特点的权利救济途径,可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制度,亦可建立独立的体育法院或在现有法院系统内部设立专门的体育法庭,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运动员权利救济机制。

注释:

【注1】第33条:“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

【注2】1994年,国际奥委会和其他一些国际体育组织酝酿对仲裁法庭进行改革,具体措施是在法庭之上成立一个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of Sport)。该理事会由社会知名人士和体育界人士共同组成,任务是保障体育仲裁法庭的独立性以及当事人的权利,在行政管理及财政上负责监督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另外,法庭的章程也进行了修改,在人员组成上减少了由国际奥委会指定的人数,而增加了诸如运动员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指定的人数,以使这个组织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在财政上,该法庭也开始接受社会的赞助,而不再仅仅依靠国际奥委会。这些改变有效地加强了体育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使之有可能在国际体育界树立自己的权威。

【注3】第3条: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

【注4】第2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注5】第13条: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注6】《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九条

【注7】《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第五十一条

参考文献:

- [1] 张维.权利的救济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救济权的法理阐释[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报),2008(3):19-28
- [2]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6778>
- [3] 蔡宏生.我国运动员权利的实现与保障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39-46
- [4] 男篮:姚明“一元钱”官司达成和解[EB/OL].中体在线,新浪网,2003-10-18
- [5]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EB/OL].2003-11-02
- [6] 从“中国首例涉药奥运冠军”到通过法律手段解除禁令[EB/OL].南方都市报,2011,4(9):GB03,南都网,2011-04-09:
- [7] 郭树理,周小英.奥运会特别仲裁管辖权问题探讨[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4):49-505
- [8] 彭昕.运动员申诉权问题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44(7):43-47
- [9] 国际田联驳回古巴反申诉 刘翔终获银牌[EB/OL].凤凰网体育,2011-08-29.
- [10] 冯树勇.申诉 为了公平、权利及职责[N].体坛周报(2386),2011,08(31)A3.

(责任编辑:陈建萍)